

秦襄公述论

刘光华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我国古代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的祖笈就在秦(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而这个统一王朝的开国始祖,就是公元前七七一年“始列为诸侯”^①的秦襄公。

秦襄公是秦国的创建者。关于他的事迹,史书记载比较简略。笔者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料,对襄公建国以前秦人的历史、秦国创建的具体情况以及秦襄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作一述论。不妥之处,敬请同志们指正。

一

秦人,是我国古史上的一个古老氏族。关于它的男系祖先,最早可追溯到大业、大费。大费,司马迁认为就是伯翳、伯益;张守节说大费的父亲“大业是皋陶”。^②他们正值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皋陶、伯益是东夷族。^③传说当时东夷族与华夏族关系密切,结成了部落联盟。伯益曾“与禹平水土”,有功;又“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因而被舜“赐姓嬴氏”。禹在位时,皋陶、伯益先后被部落联盟会议选为禹的继承人。禹死后,由于“益之佐禹日浅”,禹子启破坏了民主选举部落联盟酋长的制度,杀死伯益^④,确立了王位世袭的夏王朝。

关于伯益的后代“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⑤,“殷夏之间微散”。^⑥一支生活在中原地区,一支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区。其中费氏一支曾和商汤联合,参与了灭夏的斗争。后来,大廉一支子孙也归服了商朝,并“佐殷国”,显扬于商朝。这一支后代的中湫,不知何故于商朝末年“在西戎,保西垂”,迁徙于西戎居住区。后来被周孝王封于秦的非子,就是从这一支繁衍出来的,我们称作秦人,或叫嬴秦。

中湫西迁后的秦人的社会经济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畜牧业比较发达。例如西周中期的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居于犬丘^⑦的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因此替周孝王“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所以有的同志认为,“秦人在当时还保存着狩猎、游牧民族的传统”。^⑧不过从已报导的考古资料来看,甘肃天水地区古代居民的社会经济,在商、周及其以前,农业就占有很大比重。解放初期,考古工作者在甘

肃东部进行过文物古迹的普查工作，在渭水、西汉水和泾水流域“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存”，而且“都发现齐家文化压在仰韶文化上面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在时间上的先后继承性；遗存集中，遗址面积较大，堆积层较厚，都发现有住室建筑、窑址、斧、刀、铲、纺轮等石器和大量陶器。^⑨依据这些特征，肯定地说其主人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⑩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这种不一致，应是当地居民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农牧结合经济的客观反映。正是由于畜牧业也比较发展的特点，所以周王室要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文献中也就保存了这方面的有关记载。非子因养马有功，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

关于秦邑的具体所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这个意见大体是正确的，不过比较简略。《水经注》记载“（秦）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杨守敬认为，秦亭所在的秦川有广狭二义，狭义之秦川因秦水而得名。秦水即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的后川河，是清水（古代又称东亭水、桥水，即今牛头河）的支流。秦水有二源，一出大陇山，一出秦谷，两源合流后“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此秦川又名长家川，即今张家川后川河河谷地，这就是秦邑的具体所在地。^⑪广义之秦川指清水（包括其支流）流域，“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约指今张家川、清水两县地。^⑫

由于非子被封于秦，便使原来的嬴姓族分为两支，一支即以非子封地为中心的秦，一支即仍然居于西犬丘的嬴姓嫡系后代，《秦本纪》称作“犬丘大骆之族”。

秦、戎共居同一地区，是友好相处、互通婚姻的。例如戎族的申国国君就曾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郟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湫，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非子父亲）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但是自非子邑秦之后，秦戎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一度攻占了西犬丘。周宣王为了对抗西戎，“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战败身亡，宣王又“召（秦仲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秦人的两支力量大概在和西戎斗争中团结一致，取得了胜利，为了保存实力便又统一起来，其中心在新收复的西犬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秦仲、庄公政治地位的变化：从“附于诸侯”的附庸晋升为王室的大夫、西垂大夫。从此，秦人就肩负王命，名正言顺地替周王室守卫西陲，抗拒戎族。

秦襄公是秦庄公的第二个儿子，庄公西垂大夫职务本应由其嫡长子世父承袭，但世父立志要替秦仲报仇，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因而把西垂大夫职务让给了弟弟秦襄公。襄公于周幽王五年（公元前七七七年）承袭父位，其时正值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西戎强大，它不仅是周王室的严重威胁，也是秦人的严重威胁，庄公打败西戎，是得到宣王大力支持，所以西戎之败却不等于秦人的强大；加之在周王室已经衰弱不能依赖的情况下，秦襄公对西戎的斗争策略有了变化。他和世父相反，很有远见，在承袭父位的当年，即“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以改善秦戎间的紧张关系；次年，他又将政治中心从西犬丘东迁到汧。^⑬襄公徙汧，为以后秦的建国及其东向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秦国是秦襄公创建的。它的建立，与周王室内乱、西戎攻入镐京（今西安市西）有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西周末年西戎强大。周宣王前期对西北戎族用兵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后期攻太原戎、条戎、奔戎以及秦仲伐戎，却都遭到了失败^⑭；周幽王即位后曾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作卿士，又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而幽王宠爱褒姒，废嫡立庶^⑮，又终于引发了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促成了西周的灭亡。《史记·周本纪》记载：

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申后的父亲申侯勾结犬戎，进攻幽王，其目的是企图用武力教训幽王，以恢复申后和太子的合法地位，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引来的犬戎，却把幽王给杀了；而犬戎被引诱进攻西周，也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为了掠夺。不管他们各自出于什么目的，历史的现实却是腐朽、没落的西周统治被摧毁了。

幽王被杀，攻入关中的犬戎到处大肆抢掠，西垂大夫秦襄公一得知消息，便率领军队从汧城顺流而下，和卫武公率领的军队一起，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打败了犬戎。犬戎“尽取周赂而去”，退出了镐京。与此同时，申侯为了逃避幽王被杀的罪责，向各诸侯发出了“勤王”的邀请，“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由于镐京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歧丰之地被犬戎控制着，周王室又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于是新即位的平王决定迁都，以“辟戎寇”。在秦襄公等率领的武装护卫下，平王“东迁于雒邑”，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

在这次平定戎乱中，“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接着他又“以兵送周平王”东迁。因有这两件特大功劳，平王便“封襄公为诸侯”，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新建秦国成了与郑、宋、齐、晋诸大国平起平坐的一员。平王在册封秦襄公的命辞中宣布把“歧、丰之地”封赐给秦国：“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命辞透露了一个严重的事实，即犬戎虽然退出了镐京，但并未撤离“歧、丰之地”，所以平王才郑重地将这块沦陷区赐给秦国，其实就是要秦襄公担负起驱逐戎族的艰巨任务。从此，秦人与戎族的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说到这里便有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说几句。司马迁在《秦本纪》里叙述平王封赐襄公土地时，提出了一个矛盾的说法。兹将原文再录于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司马迁所概括的“赐之岐以西之地”，与平王的命辞是抵牾的，而命辞却是毋庸置疑的。《秦会要订补》卷十一《学校下》载：“襄公鼎铭曰：天公迁洛，岐丰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岐丰之岐，山名，也作地名用。作地名用的岐，指先周古公亶父“止于岐下。……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⑩的岐山以南的岐周，其中心地区在今陕西岐山县以东扶风县以北两县交界一带的京当、黄堆和法门诸公社之间。^⑪岐的方位既定，则“岐以西之地”大体指渭水以北的泾水两岸，包括今陇县、泾阳、宝鸡、凤翔和岐山等县市。这一带早就是秦人活动的地区，如非子“主马于泾、渭之间”，“秦襄公二年徙都泾”；秦襄公列为诸侯的第二年，他还在今凤翔县南的三嵎原上“乃用骝驹、黄羊、羝羊各三，祠上帝西嵎。”^⑫这些都说明周平王东迁前后，岐西之地是秦人的活动区，不是西戎占领区。命辞中所说的“岐、丰之地”，就是《史记·匈奴列传》的“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的“泾、渭之间”，指岐周以东至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沔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一带因被犬戎“侵夺”并留“居”，所以平王在命辞里明确地指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七六六年）“伐戎而至岐，卒”，病死在进军途中^⑬，所谓“伐戎而至岐”，也说明岐西并非犬戎占领区。又襄公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文公伐戎在岐以东，而且彻底打败了犬戎，“戎败走”，收复了“岐、丰之地”，并将岐、丰之民迁于岐西，把无人的岐东地奉献给了周室。如果平王接纳岐东之地，那也只能说明他自食其言，不能作为司马迁“赐之岐以西之地”说法的依据。所以，司马迁“赐之岐以西之地”的说法与命辞不符，其错误是非常清楚的了。^⑭

三

秦襄公平戎救周，是两周之际的一个重要事件。首先它挽救了已被犬戎摧毁了的周王室。幽王被杀，犬戎攻入宗周，据有岐、丰之地等，对姬姓贵族统治来说决非小事。然而自厉王以来，维系姬姓贵族统治和周天子最高权力的宗法制度越来越不起作用，那么多姬姓国家在天子殉难，宗庙被毁，烽火四起的时刻却无动于衷，仅有姬姓的卫武公和西垂大夫秦襄公出兵勤王。若不是秦襄公等力战犬戎，安定王室，护卫东迁，周王室的存在将成问题，历史进程或将显示出更加复杂的情况。其次，对秦襄公平戎救周的行动，我们如果与稍后的伯主作为来对比，虽然他是西垂大夫，勤王时还没有日后伯主那样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是春秋时代尊王攘夷的滥觞。他的平戎救周不是政治策略，而是真心实意的安定、卫护周王室，这就为春秋时代各强大诸侯国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能团结中原诸侯以对抗周边族向中原地区发展的策略口号的借鉴，也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最后，司马迁很重视秦襄公因平戎救周而“始列为诸侯”这个事件，在《史记》的《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陈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封禅书》、《匈奴列传》中都有记录，而且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还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岁，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班固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也有类似记载）把秦襄公建国作为秦国发展史上

的兴起阶段。这个看法是很深刻的。所谓“秦起襄公”，我以为不仅是说襄公“始列为诸侯”，创建了秦国，是秦人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襄公在创建秦国之时，就取得了日后发展的合法条件。秦国的发展首先与“攻逐”西戎有直接关系，尤其向岐、丰之地发展，是得到了平王明确承认的，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关中地区，是秦国东向发展的范围。秦国发展的第二步就是兼并六国，它据有关中后，又经过秦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关中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②成了秦国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所以秦襄公平戎救周的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积的意义。

秦襄公从列为诸侯到死，总共只有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方面，即同西戎斗争和吸收先进的周文化。

新建秦国和西戎的斗争，是关系着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事，而斗争的重点，主要在冲破戎族对自己根据地的包围，这是秦襄公面临的首要任务。不过在西、东周之交，戎族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豳、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

戎族各部或从西向东，或从北向南迁徙，遍布“自陇以东，及乎伊、洛”的广大地区。随着这种大规模的向黄河中游地区的迁徙，戎族的力量便逐渐分散、削弱着，这对秦国在陇山以西冲破戎族的包围，开拓疆土，是十分有利的。《史记·封禅书》记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是说他列为诸侯之后又把国都从济城迁回到西犬丘，其就是要解决东进的后顾之忧，在渭水上游开拓疆土，可惜史无记载，只好阙如。大约经过几年斗争，秦国的后方稳固了，秦襄公才开始东进伐戎，不幸他第一次东进伐戎进军至歧而身亡。

秦、戎在陇山以西的斗争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例如秦襄公的“襄”，就是他和戎族斗争的证据。我国古代有一种谥法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死后，时人或其后人可依据他生前的主要活动，给他一个评价，这评价不能长篇大论，只能用一个字表示，这就叫“谥”。相传谥法是周公旦制定的。“襄”，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所记：“甲冑有劳曰襄”，“辟地有德曰襄”。秦襄公的后人给他立这个“谥”，除了歌颂他平戎救周（“甲冑有劳”）外，也是为了歌颂他和戎族斗争以开辟疆土的功劳的。另外，《诗·秦风》有《小戎》三章，《毛诗序》曰：“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孔疏》曰：“……而襄公能悦以使之，国人忘其军旅之苦，则矜其甲车之盛。”^②说襄公之时“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而“国人忘其军旅之苦”，上下齐心，对付西戎，除了能掠夺奴隶和财物外，也是为了开辟疆土。

秦国和戎族的斗争是长期的，襄公时期仅仅是开始，它一直继续了几个世纪。

建国以前的秦人和戎族共处，因而其社会存在着浓厚的氏族制习俗，比较落后。但自非子、秦仲起，因接受周王室册封，周文化开始对秦人发生影响。例如《毛诗·车邻

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所谓“车马礼乐侍御”，在西周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他们乘坐的车，祭祀、宴会时所奏的乐各有不同，这不同便是区分其等级高下的标志。秦仲受周宣王册封为西垂大夫，享用与西垂大夫身分相适应的“车马礼乐侍御”，便使秦人和西戎在文化上发生了差异。而秦襄公列为诸侯之后，周室的礼乐文化对秦国的影响就更大了，除了“车马礼乐侍御”之外，又享有“田猎之事，囿圃之乐”^②；同时，还可以“与诸侯通使聘享”，直接吸收东方诸侯国的先进文化。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在三畤原上发现的著名历史文物——十块圆柱形的刻石。因刻石像鼓，故称“石鼓”；每块石鼓上因各刻四言诗一首，字体为秦篆（大篆），故古文学家把这种文字称作“石鼓文”。石鼓文是秦人刻石，现在已没有异议了。在许多研究者中，郭老认为：“石鼓诗”的内容与秦襄公的事迹相符，因而断定它是秦襄公时的遗物，是秦襄公平戎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受册封为诸侯后凯旋回国作西畤时的纪功碑；“石鼓诗”和《诗经》的《秦风》、《大雅》以及《小雅》的《车攻》、《吉日》等诗，在情调、风格、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很类似，这又说明秦襄公新建的秦国在文化上的突飞猛进。文化的发展有继承性，为什么秦国突然会有如此高度文化水平的诗歌？追其原因，郭老认为最大可能是周王室东迁时，有一批太史之类的官员留了下来，并且作了秦国的文化官员，替秦襄公做文字工作，“石鼓诗”就是他们的作品。^③因此我们可以说，“石鼓诗”不仅是秦襄公平戎救周的记功碑，而且还是秦国接受周文化的里程碑。

* * *

以上我们谈了秦襄公平戎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对历史发展有极积意义。襄公和戎族斗争以开拓疆土，仅仅是开始，他向东发展也没有越过歧；对他接受中原文化，我们也不能无限度的拔高，例如《毛诗·蒹葭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笺》亦曰：“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汉代人对于《蒹葭》的解释，基本上反映了秦建国时较中原诸国落后的状况。秦国对中原文化从“未习”到习应有一个过程。春秋时代的中原各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而秦国还必须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一段后才能赶上去。《诗·黄鸟》是秦国“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④的诗，《秦本纪》记此事说：秦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八人”。用奴隶殉葬在中原各国已受到舆论谴责的时代，秦穆公公然用贵族殉葬，其数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所以从秦襄公开始，秦国社会进步较快，但它仍比中原各国大大落后，这也是客观现实。不过对这种落后也应一分为二，正因为秦“杂戎狄之俗”，所以秦襄公列为诸侯后就“作西畤用事上帝”，司马迁为认这是僭越周礼^⑤，其实正是秦人蔑视中原传统，对周礼无所顾忌的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的表现。




[注释]：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② 《史记·秦本纪·正义》。

③ 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54页；林剑鸣：《秦人平

期历史探索》，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 ④ 《史记·秦本纪》、《夏本纪》。《夏本纪》没有交代伯益的下落，此处据《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益于启位，启养之”叙述。
- ⑤ 《史记·秦本纪》。以下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同此。
- ⑥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⑦ 一般认为历史记载中的犬丘有二，一在今陕西兴平县，周懿王曾都于此；一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也称西犬丘、西垂，即汉代的西县，非子所居。
- ⑧ 见注③林文。
- ⑨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 ⑩ 金文秦字作、、诸形；《说文解字》：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声；一曰秦，禾名。”都反映出秦与农业有直接关系。
- ⑪ 据《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的说法，知非子初封之地不大，约在今后川河谷地。
- ⑫ 以上引文和叙述，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17。
- ⑬ 《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郿城在郿州郿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郿郿，即此城。’”郭者据此认为，《秦本纪》襄公二年“四字下有夺文”，至确，见《石鼓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页。郿城在今陕西郿县附近。
- ⑭ 《后汉书·西羌传》。
- ⑮ 《史记·周本纪》。
- ⑯ 同上。
- ⑰ 近年来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县的风雏村发掘了先周宗庙建筑遗址，得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收获十分丰富，该地当是周人在周原居住的中心地区。详情见1977年《周原考古》第9期和《文物通讯》第4期的报导。
- ⑱ 秦襄公“祠上帝西畴”的年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于襄公八年。
- ⑲ 据司马迁“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养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的记载法，推测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当是在进军途中病死。
- ⑳ 据《十三经注疏》本《毛诗·秦风·秦晋》郑玄在《笺》中早就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提出了襄公“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的意见；孔颖达同意郑说，在《疏》中也指出：“《本纪》之言不可信也。”不过他们虽正确地指出了司马迁之错，却说襄公“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与命辞也不符合。
- ㉑ 《史记·货殖列传》。
- ㉒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下引《诗》同此。
- ㉓ 《毛诗·驹骖序》。
- ㉔ 以上据《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内容转述。王国维认为，“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六国用古文说》）王说亦可证郭老之说不悖。
- ㉕ 《毛诗序》。
- ㉖ 《史记·六国年表序》：“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隳于郿祀，君子惧焉。”